

從《清議報》（1898-1901）看日語三字詞 對漢語的影響

朱京偉*

摘 要

作為中日詞彙交流史的研究資料，《清議報》值得特別關注。本文利用詞彙學研究的方法，通過詞語抽取、詞源調查、詞構成分析等步驟，旨在對《清議報》中的日語借詞作系統的發掘與整理。以往的日語借詞研究總是把重點放在辨別與整理二字詞形式的日語借詞方面，而對三字詞、四字詞形式的日語借詞則關注不多，很少有人對此進行專題討論。有鑑於此，本文將以《清議報》中三字詞為研究對象，辨別其中的日語借詞，並對相關的研究方法進行歸納。

關鍵詞：清議報、三字日語借詞、中日詞彙交流

* 作者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系教授。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Three-Chinese Character Words to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spaper *QingYiBao*

Zhu Jing-wei

Abstract

As a source for research of historical lexicolog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QingYiBao*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ology of vocabulary study, such as lexical investigation, etymology, analysis of words which we aim to make a systematic study of loanwords from Japanese in *QingYiBao*. Previous studies about loanwords from Japanese mainly focused on distinguishing and sorting out two-character Japanese loanwords, while three-character and four-character Japanese loanwords were paid little attention, and related discussions are rare, either. For this reason, this article takes three-character words in *QingYiBao* as the object of study, distinguishes loanwords from Japanese within it, and summarizes related studying methods.

Keywords: Newspaper *QingYiBao*, Three-Chinese character Loanwords from Japanese, Exchange of vocabulary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從《清議報》（1898-1901）看日語三字詞 對漢語的影響^{*}

朱京偉

一、前言

作為中日詞彙交流史的研究資料，《清議報》值得特別關注。它在時間上緊接在《時務報》之後，由梁啟超主持編務並撰稿，是最早在日本創辦發行的中文報刊。¹ 梁啟超（1873-1929）向來對使用日語詞彙持積極態度，加上當時又身在日本，可以方便地接觸與吸收日語詞彙。此外，《清議報》的外報翻譯欄雖然沒有像《時務報》的古城貞吉（1866-1949）那樣有名的翻譯撰稿者，但該欄的內容主要取自日文報刊，也為直接借用日語詞彙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本文利用詞彙學的研究方法，通過詞語抽取、詞源調查、詞構成分析等步驟，旨在對《清議報》中的日語借詞作系統的發掘與整理。

筆者按照既定原則從《清議報》中共抽出各類詞語1,772個（單計詞數，下同），其中包括二字詞1,053個（59.4%），三字詞411

* 本文係中國大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清末報紙與譯著中的日語借詞」（項目編號：11BYY119）之部分研究成果。

¹ 1898年5月至8月在日本神戶創刊發行的《東亞報》（*Eastern Asia News*）比《清議報》略早數月，現存有9期。參見黃興濤：〈新名詞的政治文化史——康有為與日本新名詞關係之研究〉，《新史學》（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12月）一文中的相關介紹。

個 (23.2%)，四字詞 294 個 (16.6%)，以及四字以上的多字詞 14 個 (0.8%)。抽出詞語的總體情況如表一所示：

表一：從《清議報》中抽出的研究對象詞（單計詞數）

年度	冊數	二字詞 (1053 詞 / 59.4%)				三字詞	四字詞	多字詞	合計
		有典	新義	無典	未收				
1898	1	44	8	5	0	11	8	0	76
1899	2-33	543	49	121	26	200	145	8	1092
1900	34-67	69	8	28	7	89	66	1	268
1901	68-100	102	5	26	12	111	75	5	336
詞數合計 (%)		758 (72.0)	70 (6.6)	180 (17.1)	45 (4.3)	411 (23.2)	294 (16.6)	14 (0.8)	1772

其中，三字詞、四字詞的數量雖然遠不及二字詞，但在清末以前的漢語裏，非熟語類的三字詞四字詞原本就數量有限，而《清議報》前後正是此類三字詞四字詞開始增多的時段，其作為詞彙史研究資料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同時，以往的日語借詞研究總是把重點放在辨別與整理二字詞形式的日語借詞方面，而對三字詞、四字詞形式的日語借詞則關注不多，很少有人對此進行專題討論。有鑑於此，本文將以《清議報》中三字詞為研究對象，辨別其中的日語借詞，並對相關的研究方法進行歸納。

在抽出的 411 個三字詞中，“美術+家、通航+權、工業+國”一類的 2 + 1 型三字詞有 391 個，佔三字詞總數的 95.1%，而“大+資本、原+動力”一類的 1 + 2 型三字詞僅有 20 個 (4.9%)。由於 1 + 2 型三字詞的數量很少，本文將以構詞能力最強的 2 + 1 型三字詞為研究對象。

二、區分日語三字詞與非日語三字詞

2 + 1 型三字詞以“前部2字語素 + 後部1字語素”的形式構成，由於前語素與後語素在組合時具有相當大的派生性和臨時性，事實上，無論漢語或日語的工具書都無法盡數收錄三字詞。因此，要想區分來自日語的三字詞與中國人自造的三字詞，不能依靠通常的工具書，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在日本明治時期的各類文獻中查找例證。依據查找例證的結果，可以把《清議報》中的2 + 1 型三字詞分為以下3種情形：²

(一) 在早於《清議報》的日方資料中可以找到用例的三字詞

依據日方用例早於中方用例的事實，可判斷該詞源於日語。以“國際法”一詞為例，《清議報》中的用例如下：“乘法京有大博覽會之舉，初開此會議，……或討論國際法之原則，或講究國際法實施之方。”（第15冊，外論匯譯：〈萬國平和同盟說源流考〉，1899年5月20日）《漢語大詞典》中沒有收錄“國際法”一詞，就連詞條“國際”，也只有釋義而沒有舉出任何書證。《近現代詞源》（2010）收有“國際法”一詞，所引用的書證出自《清議報》（同上例）。

在日語方面，《日本國語大詞典》中「國際法」一詞的最早書證出自德富蘇峰（1863-1957）的著作《將來之日本》（1886）。據現有資料，明治初年的學者箕作麟祥（1846-1897）應是最早使用「國際法」一詞的人。他在《國際法：一名萬國公法》（弘文館，1873年）一書的卷首「例言」中說：

此学科ノ書ハ曩時米人丁韋良氏漢文ヲ用ヒ，同国ノ人惠頓氏

² 爲了區別文中的漢語與日語，本文在引用時，漢語詞用“ ”，日語詞用「 」。

ノ書ヲ訳シテ始メテ命スルニ万国公法ノ名ヲ以テシ，……
恰モ此書普通ノ称タルカ如シ，然レトモ仔細ニ原名ヲ考フル
時ハ國際法ノ字，允当ナルニ近キカ故ニ今改メ國際法ト名
ク……。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知日方用例明顯早於《清議報》中的用例，我們可以據此判斷“國際法”是清末時期從日語傳入漢語的日語借詞。

又如“研究所”，在《清議報》中有如下用例：“日清貿易研究所，今竟不振。故育成人才，以謀振興，是今日之急務也。”（第23冊，萬國近事〈在華貿易談〉，1899年8月6日）該文章以日本為敘述主體，且標明譯自“讀賣新報”。由於《漢語大詞典》與《近現代詞源》（2010）等中方詞書均未收錄“研究所”一詞，所以《清議報》中的“研究所”是目前所見的中方最早用例。

在日語方面，《日本國語大辭典》中「研究所」的最早書證出自中江兆民的著作《一年有半》（1901）。而筆者目前所見的日方最早用例，出自森隆介（1856-1933）的《常總農事要論》（1886）一書：「蓋シ農業研究所ノ設立タル其目的ハ生徒ヲ募集シ，之ニ授クルニ學術ト實驗ヲ以テシ，大ニ実業生ヲ養成ス可キハ勿論」（第十）。鑑於日方用例明顯早於中方用例，而且《清議報》中譯自日語的用例可以視為該詞進入漢語的佐證，我們有理由判斷“研究所”是日語借詞。

上述這類詞在《清議報》中共有358個，佔2+1型三字詞的91.6%。因詞數眾多，僅舉少數例詞如下：

愛國心 愛國者 半島國 保護國 保守黨 保守派 爆裂彈 悲觀的
被治者 辯護人 博覽會 博物館 裁判官 裁判所 財政策 財政權
財政學 參謀部 參謀長 參政權 產出物 常備兵 常備軍 懲役人
除幕式 傳教師 粗制糖 大和魂 代表者 代理店 代理人 代議士
代議院 當局者 地理的 地質學 電信隊 電信局 動物學 獨立國
發言權 繁殖力 反動力 訪事人 敷設權 改革派 公共性 急進派

極左黨 講習所 經濟力 員警隊 聯合國 劣等國 潛水艇 勢力圈
外交界 先進國 修繕所 學術語 藝術界 魚雷船 資本力 自由派
宗主權

（二）在早於《清議報》的日方資料中找不到用例的三字詞

依據中方用例早於日方用例的事實，可推測該詞是清末中國人自造的新詞。例如“無線電”，《清議報》中的用例如下：“而今所用者唯魚形水雷，然利用無線電之水雷，亦將見於近日矣。”（第51冊，時論譯錄：〈十九世紀海軍之進步〉，1900年7月17日）這篇文章署名“日本木村浩吉”，是譯自日語的文章，但其中的“無線電”究竟是不是日語借詞仍需要考證。在漢語方面，《漢語大詞典》中“無線電”一詞只舉出柳青（1916-1978）的小說《銅牆鐵壁》（1951）作為書證，而《近現代詞源》（2010）所引用的書證出自《清議報》（同上例）以及康有為的《英國遊記》（1904）等。

在日語方面，《日本國語大詞典》等詞書收有「無線電信」、「無線電話」等詞條，但沒有「無線電」。在明治時期的其他文獻中也沒能查到「無線電」一詞。從中方用例早而日方無用例的情況看，“無線電”應是清末國人自造的新詞。漢語的“無線電”一詞或許是在日語「無線電信」等詞的影響之下形成的，但是要證明這一點，必須有足夠的用例去釐清從日語四字詞變為漢語三字詞的過程。

再如“機關報”，《清議報》中的用例如下：“日本某大政黨之機關報，其名曰大帝國徵文於餘，草此應之。”（第19冊，本館論說：〈論中國人種之將來〉，1899年6月28日）這篇文章署名“哀時客梁啟超”，且內容與日本有關，令人產生“機關報”是日語借詞的聯想。查閱中方用例，《漢語大詞典》所引用的書證為瞿秋白《餓鄉紀程》（1920）。《近現代詞源》（2010）的書證出自《清議報》（同上例）與梁啟超（1873-1929）《中日交涉匯評》（1915）等。這表明《清議

報》中的用例是中方現有的最早用例。

在日語方面，查閱《日本國語大辭典》等各種詞書以及明治時期的各種文獻，從中只能找到「機関新聞」、「機関砲」、「機関銃」等詞條，但查不到「機関報」。結果顯示，“機關報”並非日語借詞，而是在日語「機関新聞」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漢語新詞。明治初年，日語稱報紙為「新聞紙」，後來省略為「新聞」，而在漢語裡“新聞”和“報紙”一向是分別使用的不同概念。清末時期，日本的報刊名《○○新聞》譯成漢語時大都轉譯成《○○報》，如《読売新聞》轉譯成《讀賣新報》即是一例。屬於這一類的三字詞共有24詞，佔2 + 1型三字詞的6.1%，全部列舉如下：

白種人 別擇性 出口貨 出入口 遞電所 工程費 間選法 建國性
 機關報 腦氣筋 旁觀派 跑馬場 入口貨 生死的 特立權 天演家
 調查冊 無線電 吸集力 銷費者 照像機 直選法 貯煤所 資生學

（三）在晚於《清議報》的日方資料中可以找到用例的三字詞

在詞源調查中還發現，有少數《清議報》中的三字詞，其中方最早用例即是出現在《清議報》中的用例，而現在所能查到的日方最早用例都明顯晚於《清議報》。屬於此類的三字詞共有以下9個，佔2 + 1型三字詞的2.3%，括弧內列舉的是日方現有最早用例的出處：

國民力（司法省調査課編：《一九二五年独逸刑法草案並に理由書》，1926）

活動體（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編：《部落会・町内会とその常会の話》，1940）

礦產權（〈生徒会で決議・募金〉，《読売新聞》，朝刊2頁，1912年2月4日）

冒險性（〈物価吊上に幾多の疑惑と冒險性〉，《読売新聞》，朝

刊2頁，1933年6月25日)

忍耐力 (〈機にのぞんで反応する刺激〉，《朝日新聞》，朝刊5頁，1932年12月6日)

活動場 (〈学業研鑽の活動場を開拓〉，《朝日新聞》，朝刊1頁，1943年6月26日)

魚雷艇 (〈潰滅に近い広東海軍〉，《朝日新聞》，朝刊10頁，1937年10月4日)

探險隊 (〈探險隊の消息〉，《朝日新聞》，朝刊3頁，1902年9月21日)

郵政局 (〈京城騷亂詳報〉，《読売新聞》，朝刊2頁，1885年1月13日)

其中，“探險隊”一詞在日語裡經常以「探檢隊」的形式出現，如果檢索日語的「探檢隊」，可以查到早至1875年的用例，比中方用例要早許多，而「探險隊」的出現則稍晚於《清議報》。另外，在日語裡出現“郵政局”的時間早於《清議報》，但使用這些用例的語境均與清朝的事情有關。應該說，是日語在報導中國的事情時引用了漢語的“郵政局”。漢語中出現“郵政局”的時間比日語早，如1876年李圭著《環遊地球新錄》中的用例：“建立機器局、造錢局、電報局、郵政局、火輪舟車局以利國利民”。³據此，可將“郵政局”視為日語晚於漢語的三字詞。

對於以上這類三字詞可以有3種解釋：(1)日方用例偏晚的原因在於所見的日方資料尚不完全，因此即使日方用例晚於《清議報》也應視為日方造詞。(2)既然日方用例明顯晚於中方用例，該詞可能是清末國人所造而後又傳入日語的三字詞。(3)中日之間的同形詞不一定都有借用關係，也有中日分別造詞而詞形偶然相合的情況。總體看

³ 參見黃河清：《近現代詞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頁900。

來，屬於第1種可能性的三字詞理應佔大多數，屬於第3種可能性的三字詞實際上很少見，而第2種可能性牽涉到清末中日詞彙交流的大格局，必須依據事實十分慎重地作出判斷。在現有條件下，要想把日方用例晚於中方用例的三字詞明確區分為以上3類中的某一類是比較困難的，需要更多的實例做依據。

綜上所述，在《清議報》中收集到的391個2+1型三字詞當中，可以初步認定為日語借詞的三字詞佔絕大多數（358詞，91.6%）。這一結果表明，從甲午戰爭到二十世紀初的若干年中，在漢語裡流通的三字詞大都來自日語，正是由於日語三字詞大量進入漢語，從而帶動了漢語三字詞的增長，並使漢語三字詞的構詞類型得以完善。結果還顯示，由清末中國人自造的三字詞只佔很小的比例（24詞，6.1%），而且其中有相當部分利用了日語三字詞的構詞法，如“一性”、“一權”、“一所”、“一派”等。這表明，當時漢語本身的2+1型三字詞數量既少構詞能力也弱，與日語三字詞的強勢形成鮮明的對照。除此之外，還有少量的詞（9詞，2.3%）因資料所限尚不能明確定性。即使最終證明它們不屬於日語三字詞，其中也包含著日語三字詞的構詞特點，仍可以窺見日語三字詞的影響。

三、語素義與構詞功能均未變化的後語素

2+1型三字詞是以“前部2字語素+後部1字語素”的形式複合而成的。關於前部2字語素的特徵與性質，筆者曾在討論《時務報》的三字詞時作過較為詳細的分析，⁴本文將主要討論後部1字語素方面的問題。

從《清議報》中收集到的2+1型三字詞共有391個（單計詞數）。其中，後部1字語素在去除重複之後共有88個（單計詞數），

⁴ 參見朱京偉：〈蘭学資料の三字漢語についての考察〉，《国語研プロジェクトレビュー》第1卷（2011年），頁117-141。

即每個後部1字語素平均構成4.4個三字詞。但實際上，後部1字語素的構詞能力是有很大個體差異的。具體來看，構成三字詞在4詞及以上的後部1字語素有（括弧內為構詞數）：一家（29）、一權（22）、一的（20）、一國（20）、一學（16）、一力（15）、一黨（14）、一者（14）、一界（10）、一所（10）、……一會（4）、一式（4）、一物（4）等共34個，佔總數的38.6%。與此相對，構詞數在3詞及以下的後部1字語素有：一部（3）、一軍（3）、一炮（3）、一師（3）、一體（3）、……一表（2）、一貨（2）、一艇（1）、一主（1）、一狀（1）等共54個，佔總數的61.4%。

在日語借詞於清末進入漢語以前，漢語中並非沒有2+1型三字詞，只是數量十分有限。然而明治時期日語三字詞的主要特徵，是以同一後部1字語素為中心構成一系列的2+1型三字詞。⁵在此選取《清議報》中構詞數在4詞及以上的後部1字語素（34個）為對象，來觀察日語三字詞對漢語三字詞的影響。如果從語素義和構詞功能這兩個方面去分析日語的影響，可以把三字詞的後部1字語素分為三種情形，即：語素義與構詞功能均未變化；語素義未變而構詞功能變化；語素義與構詞功能均有變化。

以下，首先對語素義與構詞功能均未變化的後部1字語素進行分析。判斷此類後部1字語素的依據是，可以在古漢語或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資料中找到其構成三字詞的用例。在《清議報》的三字詞中，屬於此類的後部1字語素佔有很大比重，共有22個，具體詞例如表二所示：⁶

⁵ 筆者曾對此有過論述，參見朱京偉：〈在華宣教師の洋学資料に見える三字語—蘭学資料との対照を兼ねて—〉，《国立国語研究所論集》1（東京：国立国語研究所，2011年）、〈蘭学資料の三字漢語についての考察〉、《時務報》（1896-98）中的日語借詞——三字詞與四字詞部分〉，《日語學研究》22，頁94-105。

⁶ 表二中的後部1字語素以構詞數從多到少排序。左欄括弧內的／線前後分別為“日方用例早”與“日方用例無或晚”的詞數；右欄／線前後分別為“日方用例無”與“日方用例晚”的三字詞。以下各表同此。

表二：語素義與構詞功能均未變化的後部1字語素

後部1字語素	日方用例早於《清議報》	日方用例無或晚
—家 (28/1)	改革家、工商家、工業家、工藝家、建築家、教育家、經濟家、理論家、理學家、歷史家、冒險家、美術家、企業家、商業家、實業家、統計家、外交家、銀行家、營業家、戰略家、哲學家、政治家、製造家、著作家、專門家、資本家、資產家、宗教家	天演家
—國 (20/0)	半島國、保護國、獨立國、工業國、共和國、合眾國、交戰國、君主國、聯合國、立憲國、劣等國、民主國、農產國、農業國、文明國、先進國、優等國、中立國、主權國、專制國	
—學 (15/1)	財政學、地質學、動物學、國家學、考古學、理財學、倫理學、普通學、人類學、社會學、生理學、生物學、物理學、政治學、自然學	資生學
—力 (13/2)	繁殖力、反動力、活動力、結合力、經濟力、競爭力、排水力、膨脹力、生產力、同化力、團結力、戰鬥力、資本金	吸集力/ 國民力
—者 (13/1)	愛國者、被治者、代表者、當局者、勞動者、勞力者、理事者、統治者、消費者、有力者、戰死者、哲學者、主治者	消費者
—所 (8/2)	裁判所、會議所、講習所、事務所、修繕所、研究所、造船所、貯藏所	遞電所、 貯煤所
—人 (8/1)	辯護人、懲役人、代理人、訪事人、各個人、管理人、歐米人、支那人	白種人
—法 (6/2)	工廠法、國際法、會計法、收稅法、徵兵法、作戰法	間選法、 直選法

—地 (7 / 0)	根據地、居留地、目的地、水源地、未開地、殖民地、租界地	
—性 (3 / 4)	獨立性、公共性、普通性	別擇性、 建國性/ 忍耐性、 冒險性
—策 (6 / 0)	財政策、對清策、教育策、救治策、善後策、商業策	
—官 (6 / 0)	裁判官、行政官、員警官、領事官、陪審官、外交官	
—局 (5 / 1)	電信局、檢事局、鐵道局、印刷局、造船局	/ 郵政局
—場 (3 / 2)	體操場、停車場、製造場	跑馬場/ 活動場
—費 (4 / 1)	建築費、教育費、經營費、生產費	工程費
—院 (5 / 0)	裁判院、代議院、立法院、元老院、眾議院	
—點 (4 / 0)	分歧點、接續點、中心點、重心點	
—會 (4 / 0)	博覽會、委員會、研究會、哲學會	
—館 (4 / 0)	博物館、公使館、領事館、圖書館	
—式 (4 / 0)	除幕式、分列式、進水式、開會式	
—物 (4 / 0)	產出物、農產物、郵便物、制造物	
—業 (4 / 0)	工商業、海運業、商工業、造船業	

在此以表二中的“一所”、“一點”、“一性”為例，從語素義與構詞功能的角度作些具體說明：

(一) 以“一所”結尾的三字詞

“一所”在古漢語中作名詞時的基本義為“處所、地方”。查《漢語大詞典》中“所”字的釋義，發現其中的義項④為“用作官衙或公

家其他辦事機構的名稱”，並有“提綱所”、“刻漏所”等例證。此外，在《四庫全書》所收的《御定佩文韻府》（卷36之3）當中，可以查到由“一所”構成的三字單位120餘條。但經過核對每個詞條下的引文可知，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帶“之”的短語。比如列出的詞條為“降誕所”、“待詔所”、“借誦所”、“調馬所”等，而引文中的詞句卻是“降誕之所”、“待詔之所”、“借誦之所”、“調馬之所”。另有一些詞條雖然是三字單位，但通過引文可知，“一所”的含義是“處所”而不是“辦事機構的名稱”。如“刺繡所”、“談經所”、“歡宴所”、“清淨所”、“講射所”等都是出現在詩文中的詞句，釋義應為“刺繡之處”、“談經之處”、……等。

經過逐一核對，可以視為“辦事機構名稱”的“一所”及其三字詞僅有“總領所”、“刻漏所”、“營繕所”、“招賢所”、“課稅所”、“養象所”等。例如，元代脫脫（1314-1355）等編撰《宋史》（1343）中“總領所”的用例：“辛巳朔罷，鑄錢司歸發運司，並淮東總領所歸淮西總領所”（卷34）。《宋史》（1343）中“刻漏所”的用例：“其別局有天文院測驗渾儀，刻漏所掌渾儀台，晝夜測驗辰象”（卷164）。《宋史》（1343）中“營繕所”的用例：“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為公田。久之，後苑營繕所公田皆並於西城”（卷174）。元朝脫脫等編撰《金史》（1344）中“招賢所”的用例：“辛未置官領招賢所，專命內外官採訪有才識勇略，能區畫防城者”（卷14）。明代宋濂（1310-1381）等編撰《元史》（1369）中“課稅所”的用例：“國初，始置益都課稅所，管領山東鹽場”（卷85）。清代永瑤（1744-1790）等編撰《欽定歷代職官表》（1780）中“養象所”的用例：“養象所，如今之馴象所。鼓吹局，如今之旗手衛”（卷42）。

在來華傳教士主辦的期刊中也可找到少數用例。如《遐邇貫珍》（1854）有“圖繪所”一詞：“有地球亭，式制亦圓，……有圖繪所，制亦如圓球，中分上下二層，旋折而登”（第8號）。《六合叢談》（1857）中有“施醫所”一詞：“御者在路，為物所礙，掣去一

足，一足受傷，送入施醫所，俄而死”(第9號)。另有“演劇所”、“公局所”等，也屬於同類用例。

以上這些用例表明，古漢語時就有以“一所”結尾的三字詞，而且其含義與現代語的“研究所”、“派出所”等之中的“一所”(即辦事機構的名稱)十分相近，因此“一所”可以視為語素義與構詞功能都沒什麼變化的後部1字語素。儘管如此，《清議報》中出現的“裁判所”、“會議所”、“事務所”、“研究所”、“造船所”、“貯藏所”等畢竟是出自日語的三字詞，其中在漢語裡落戶者，還是應該作為日語借詞看待。

事實上，像“一所”這樣能夠在古漢語中找到三字詞用例的後部1字語素並不多見，多數情況下，主要依據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資料中的用例進行判斷。只要能在傳教士資料中找到構成三字詞的用例，便認為這些後部1字語素的語素義與構詞功能沒有發生變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表二中有些後部1字語素，如“一家”、“一學”、“一力”、“一法”、“一性”、“一點”、“一物”等，不光在中方傳教士資料中有構成三字詞的用例，在年代稍早的日方的蘭學資料中也可以找到構成三字詞的用例，以下所舉的“一點”與“一性”就屬於這種情況。

(二) 以“一點”結尾的三字詞

“一點”在古漢語中很少構詞，直到清中期以後，才在曆算書以及來華傳教士的漢文著述中出現二字詞的用例，如“中點”(清代梅文鼎(1633-1721):《曆算全書》，1723)、“交點”(《御制曆象考成》，1742)、“力點、倚點、重點”(韋廉臣:《格物探原》，1876)、“極點”(傅蘭雅:《電學須知》，1887)、“質點”(偉烈亞力、王韜譯:《重學淺說》，1890年)等。與此同時，在來華傳教士的漢文著述中還可以找到以“一點”結尾的三字詞，如“冬至點”、“公倚

點”、“秋分點”、“夏至點”（偉烈亞力編：《六合叢談》，1857）、“水沸點、相交點、懸掛點、重心點”（艾約瑟：《格致質學啟蒙》，1896）等。由此可見，“一點”是一個語素義與構詞功能均未變化的後部1字語素。

再來看日語方面，十九世紀前半期的蘭學資料裡已有「一点」構成的二字詞，如「定点」、「動点」、「黑点」、「交点」、「中点」、「重点」（帆足萬里：《窮理通》，1836）、「冰点」、「定点」、「角点」、「力点」、「燃点」、「振点」、「轉点」、「足点」（川本幸民訳：《気海觀瀾広義》，1851）等。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以「一点」結尾的三字詞，如「反射点」（《窮理通》，1836）、「沸湯点」、「集合点」、「投着点」（《気海觀瀾広義》，1851）、「飽和点」（広瀬元恭訳：《理學提要》，1852）等。以「一点」結尾的三字詞發端於蘭學資料，其構詞方法一直延續到明治時期，例如在《清議報》中出現的“分歧點”、“接續點”、“中心點”、“重心點”等三字詞，都可以在明治前半期的日方資料中找到相應的用例。

儘管蘭學資料中以「一点」結尾的三字詞在時間上早於中方的傳教士資料，但目前沒有證據表明傳教士資料在語言和內容上受到過日本蘭學資料的影響。因此，比較客觀的結論應該是，中日雙方在翻譯西文的過程中分別造出了以“一點”結尾的三字詞。

（三）以“一性”結尾的三字詞

“一性”在古漢語中意為“性情”、“性質”，原本只能構成二字詞，如“氣性”、“人性”、“天性”、“物性”、“藥性”等。清代張玉書（1642-1711）在其編撰的《佩文韻府》（1711）中羅列出歷代詩文中以“一性”結尾的三字單位40多個，如“君子性”、“清潔性”、“幽閉性”、“樂和性”、“守衛性”等。然而，用《四庫全書》（電子版）檢索原著後可知，這些三字單位大多是中間帶“之”的短

語，如“君子性”、“守衛性”的原文其實是“君子之性”、“守衛之性”，而真正可以視為三字單位的，只有“金石性”、“歲寒性”、“成人性”、“坦率性”、“物外性”等少數幾例。例如，唐代陸龜蒙(?-881)所撰《笠澤叢書》(九世紀後半)中的詩句：“諒非金石性，安能宛如昨”。唐代李延壽著《北史》(七世紀)中的詩句：“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卷29)。南宋無名氏《止堂集》(十二世紀)的詩句：“須從事上學，寧有物外性”(卷16)。這些用例都出現在有字數限制的詩句裡，可以視為“金石之性”、“成人之性”、“物外之性”的壓縮形式，而且語義重心落在詞尾的“一性”上，屬於偏正修飾結構(可釋義為“金石的性質、成人的性情”等)，這與現代語中的類詞綴“一性”相比是有明顯差距的。

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來華傳教士資料中，以“一性”為後語素的二字詞有許多，如“形性”、“惡性”、“物性”(《遐邇貫珍》，1853)、“原性”、“動性”、“浮性”(《博物新編》，1855)、“藥性”、“暖性”(《內科新說》，1858)、“反性”、“吸性”、“電性”(《電學須知》，1887)等。而以“一性”結尾的三字詞僅發現以下2例。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在《電學須知》(1887)中用過“吸鐵性”一詞：“故土人呼之為麻魚，其所發之電，能令鋼針變有吸鐵性，又能發熱，亦能化分物質”(第1章)。艾約瑟(J. Edkins, 1823-1905)在《身理啟蒙》(1896)中使用了“滲濾性”一詞：“各微絲管之壁，盡為具有滲濾性之膜造而成者，……且因其有滲濾之性，亦能導引各細孔內所遺棄之物，運而拋於外”(第5章第35節)。艾約瑟在這段文字中，先後用了2次“滲濾性”，4次“滲濾之性”。給人的感覺是，使用三字詞形式的“滲濾性”是偶爾為之，而使用“滲濾之性”則是通常的選擇。這裡的“一性”與現代漢語的類詞綴用法相近，但帶“之”的短語顯然比三字詞形式更通用。

在日語方面，十九世紀前半期的蘭學資料中已經出現許多以「一性」結尾的三字詞，如「可展性」，「可剝性」，「感受性」，「感応

性」，「凝固性」，「牽引性」，「解凝性」，「感溫性」，「痙攣性」，「神經性」，「麻醉性」等。同時，其中有部分詞的語義重心落在前部2字語素上，表明「一性」已經有詞綴化的傾向。⁷到明治初年，以「一性」結尾的三字詞繼續增加，「一性」的語素義已經抽象化，成爲一個比較典型的詞綴（日語稱「接尾辭」）。

《清議報》中以“一性”結尾的7個三字詞都是首次出現在中方資料中，然而除了“獨立性”、“公共性”、“普通性”的日方用例早於《清議報》，屬於日語的造詞之外，“忍耐性”、“冒險性”的日方用例晚於《清議報》，“別擇性”、“建國性”沒有找到日方用例。這表明，日語「一性」的語素義與構詞功能進入漢語之後，中國人很快就仿照日語三字詞的形式開始自己構成新詞了。

四、語素義未變而構詞功能變化的後語素

事實上，日語三字詞的後部1字語素都可以在古漢語中找到與之對應的同形語素，在《清議報》中出現的日語三字詞也是如此。而且如前一節所述，其中的大多數後部1字語素在語素義與構詞功能上都與古漢語或近代漢語的同形語素保持一致，沒有明顯的變化。但是也有少量的後部1字語素，其語素義未變而構詞功能發生了變化。

以“一權”爲例。在古漢語中可以找到“一權”作後語素的二字詞，如“霸權”、“兵權”、“君權”、“利權”、“強權”、“主權”、“專權”等，但是尙未發現“一權”作後語素的三字詞。此外，在十九世紀的來華傳教士資料以及日方的蘭學資料中也沒有以“一權”作後語素的三字詞。這表明，出現以“一權”作後語素的三字詞是比較晚近的事情，其源頭可以追溯到日本明治初年。調查結果顯示，在

⁷ 參見朱京偉：《〈時務報〉（1896-98）中的日語借詞——三字詞與四字詞部分》，《日語學習與研究》2012年第3期，頁19-28，7.2（1）關於「一性」的內容。

《清議報》中，以“一權”作後語素的三字詞約有8成可以在明治時期的日方資料中找到同形用例。（以下括弧內列舉的是早於《清議報》的日方用例的出處，並非首出例。）

- 自主權（明法寮編：《類聚仏国刑法》，1875）
- 行政權・所有權（箕作麟祥ら訳：《仏国法律提要》，1876）
- 司法權・立法權（中金正衡：《政学概論》，1876）
- 參政權（鈴木義宗訳編：《米国選挙法》，1879）
- 選挙權（高橋基一訳：《英国国会沿革誌》，1879）
- 自由權（太田松次郎：《自由権理論》，1881）
- 警察權（園田安賢ら：《泰西見聞録》，1887）
- 自治權（久米金彌訳：《英国地方政治論》，1888）
- 管轄權（戸水寛人：《英国平衡法》，1889）
- 優先權（三阪繁人：《民事訴訟積要》，1890）
- 管理權（奥田義人：《民法・親族法論》，1899）
- 専売權（久松義典：《近世社会主義評論》，1900）
- 制海權（巖山生：《露国と絶東》，1901）
- 発言權（田尻稻次郎：《財政と金融》，1901）

在以上各例中，「一權」的語素義與作二字詞後語素時並無不同，只是構詞功能發生了變化。在古漢語和近代漢語裡“一權”只能構成二字詞，而沒有構成三字詞的功能，進入明治時期後，「一權」在日語裡產生了構成三字詞的新用法。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在日語裡率先產生的這一新構詞功能隨著大量的日語借詞進入到漢語中來。在《清議報》的2 + 1型三字詞中，與“一權”同類的後部1字語素有7個，詞例如表三所示：

表三：構詞功能發生變化的後部1字語素

後部1字語素	日方用例早於《清議報》	日方用例無或晚
一權 (20/2)	財政權、參政權、發言權、敷設權、管理權、管轄權、警察權、立法權、司法權、所有權、通航權、行政權、選舉權、優先權、制海權、專賣權、自由權、自治權、自主權、宗主權	特立權/ 礦產權
一員 (8/0)	管理員、視察員、事務員、探檢員、通信員、選舉員、預備員、眾議員	
一隊 (6/1)	電信隊、警察隊、救援隊、軍樂隊、守備隊、義勇隊	/探險隊
一派 (6/1)	保守派、改革派、急進派、理想派、溫和派、自由派	旁觀派
一兵 (5/0)	常備兵、野炮兵、義勇兵、徵募兵、輜重兵	
一艦 (5/0)	驅逐艦、水雷艦、特務艦、巡洋艦、戰鬥艦	
一心 (5/0)	愛國心、公共心、共同心、建國心、名譽心	

以上這些後部1字語素在古漢語和近代漢語裡一般都只能構成二字詞，直到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才開始作為三字詞的後部1字語素出現在漢語當中。表三顯示，“日方用例早”的三字詞佔絕大多數，就連那些“日方用例無或晚”的少數三字詞也是仿照日語三字詞的形式構成的。只要了解以上事實，就不難判斷這些後部1字語素構成三字詞的功能是在日語的影響之下產生的。

五、語素義與構詞功能均有變化的後語素

在研究日語對漢語的影響時，除了關注從日語引進的大量新詞語——日語借詞之外，還應探討日語構詞法對漢語詞彙的影響。如上一節所述，原本在漢語中只能構成二字詞的後語素，經過近代日語的改造而成爲可以構成三字詞的後語素，這種構詞功能的擴展也是日語影響漢語的一種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少數三字詞的後部1字語素在構詞功能發生變化的同時，語素義也在日語的作用之下出現某種程度的變化，這種現象同樣值得我們去逐一追蹤並加以探明。《清議報》中屬於此類的後部1字語素有以下3個，如表四所示：

表四：語素義與構詞功能均有變化的後部1字語素

後部1字語素	日方用例早於《清議報》	日方用例無或晚
一黨 (14/0)	保守黨、反對黨、改革黨、革命黨、共和黨、國民黨、急激黨、急進黨、極左黨、進步黨、社會黨、憲政黨、虛無黨、自由黨	
一界 (10/0)	金融界、經濟界、商業界、思想界、外交界、文學界、藝術界、哲學界、政治界、宗教界	
一品 (7/0)	工業品、禁製品、美術品、輸入品、消耗品、原料品、製造品	

以下對這3個後語素的演變情況分別進行歸納：

(一) 以“一黨”結尾的三字詞

“一黨”在古漢語裡意爲“同夥”、“團體”、“族類”等，作後語素時主要構成二字詞，如“鄉黨”、“父黨”、“私黨”、“死黨”、

“亂黨”、“逆黨”等。以“一黨”結尾的三字詞僅見明朝萬曆年間的“東林黨”，如《明史》（1739）記載：“又請出客氏於外請誅崔文升，忌者甚眾，指為東林黨，未幾卒”（卷246）。而其中“一黨”的含義仍舊是“同夥”、“團體”。此外，在十九世紀日方的蘭學資料與中方的傳教士資料中，均沒有發現以“一黨”結尾的三字詞。

然而明治維新以後，隨著議會政治在日本的興起，「一黨」在日語中的語素義很快從舊時的“同夥”轉變為“政黨”。例如，在《哲學字彙》（初版，1881）中可以找到「Party 徒黨，Conservative party」、「保守黨，Moderate party 應時黨」、「Progressive party 進步黨」、「Radical party 過激黨」等英日對譯的例證，其中的「一黨」或許還多少保留著一些“同夥”、“團體”的舊義。與此同時，諸如「共和黨」（1878）、「社會黨」（1880）、「保守黨·自由黨」（1881）、「虛無黨·反對黨」（1882）、「急進黨」（1884）、「改革黨」（1885）、「革命黨」（1886）、「國民黨」（1889）、「進步黨」（1897）等三字詞形式的政黨名稱在日本社會紛紛出現，⁸對「一黨」的語素義向“政黨”過渡具有重要作用。這些政黨名稱通過《清議報》等途徑進入到漢語之中，為漢語的“一黨”帶來了新涵義以及構成三字詞的新功能。

（二）以“一界”結尾的三字詞

“一界”在古漢語中作名詞時意為“界限”、“範圍”，或指“某一特殊的境域”。常見的二字詞如“法界”、“天界”、“疆界”、“世界”等，也有少數三字單位，如出現在古詩裡的“青蓮界”、“廣寒界”、“銀色界”等，佛語裡也有“虛空界”、“地獄界”、“無盡界”一類的三字詞。總之，“一界”在古漢語裡並不具有顯著的構詞能力。

然而在明治初年，「一界」成了日語中一個相當活躍的構詞語素。由「一界」構成的三字詞，或表示對自然事物的分類，如《哲

⁸ 括弧內數字為筆者目前所見的日方最早用例的年代，下同。

學字彙》(初版, 1881)中出現的「Mineral kingdom 鈹物界」、「Vegetable kingdom 植物界」、「Animal kingdom 動物界」。或用來表達社會上按職業劃分的不同領域, 如「宗教界」(1882)、「政治界」(1888)、「哲學界」(1890)、「經濟界」(1891)、「商業界・思想界・文學界」(1893)、「金融界」(1900)等。與古漢語中的“一界”表示抽象含混的“特殊境域”相比, 日語三字詞中的「一界」表示的是實實在在的分類範疇, 應該說, 其語素義發生了轉移。這些由「一界」構成的日語三字詞通過《清議報》等途徑進入漢語之後, 清末國人迅速加以利用, 甚至還仿照日語的構詞法造出了漢語獨自的以“一界”結尾的三字詞。⁹

(三) 以“一品”結尾的三字詞

“一品”在古漢語中作名詞時大多表示“事物的種類”、“等級”, 如“上品”、“人品”、“極品”、“妙品”等均是如此。與此相對, 日語「一品」的語素義偏重於表示“對象”、“東西”本身, 如來自日語的二字詞「作品」、「製品」、「商品」等, 其中的「一品」所指的都是“東西本身”而非“東西的等級”。¹⁰而且, 目前尚未發現“一品”在古漢語和近代漢語裡構成三字詞的用例。

在日語方面, 早在蘭學著述中就已出現了不少以「一品」結尾的三字詞, 如「奇重品」(川本幸民訳《気海觀瀾広義》, 1851)、「起熱品」、「油膩品」、「人工品」、「植物品」、「滋養品」(緒方洪庵訳《扶氏經驗遺訓》, 1857)等。¹¹到明治初年, 以「一品」結尾的三字詞

⁹ 章清從概念史的角度對“一界”詞群在清末社會的傳播演變作了詳細的研究, 請參見〈「界」的虛與實: 略論漢語新詞語與晚清社會的演進〉,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7 (2011年3月), 頁55-76。

¹⁰ 日語的「一品」之所以偏重於「對象」、「東西」, 是由於受到訓讀「品=しな」的影響。

¹¹ 參見朱京偉: 《〈時務報〉(1896-98)中的日語借詞——三字詞與四字詞部分》, 《日語學習與研究》2012年第3期, 頁19-28, 第6節。

進一步增多，其中有不少進入了漢語。以《清議報》中出現的三字詞為例，「輸入品」（1869）、「製造品」（1877）、「消耗品」（1883）、「工業品」（1887）、「美術品·禁制品」（1888）、「原料品」（1890）等詞，都可以在早於《清議報》的日方資料中找到用例。日語的「一品」表示“東西本身”而且可以構成三字詞，這些特點隨著日語三字詞一起進入到漢語之中，從而使漢語“一品”的語素義與構詞功能都發生了變化。

六、日語「一的」「一上」對漢語的影響

在日語中，「一的」與「一上」並非構詞語素，其功能主要體現在句法層面上。由於它們在實際運用中大多以“二字詞+的”與“二字詞+上”的形式出現，而且這些用法通過《清議報》等途徑直接進入到漢語裏，對漢語“一的”與“一上”的用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本文將它們放在三字詞中進行討論。在《清議報》中出現的與日語影響有關的“一的”與“一上”有以下用例：

表五：《清議報》中“一的”與“一上”的用例

後部1字語素	日方用例早於《清議報》	日方用例無或晚
一的 (19/1)	悲觀的、地理的、國家的、國民的、經濟的、絕大的、絕對的、空想的、歷史的、民主的、破壞的、人種的、世界的、外交的、文明的、政治的、殖民的、中心的、宗教的	生死的
一上 (9/0)	財政上、法律上、交通上、經濟上、理論上、社會上、藝術上、政治上、宗教上	

(一) “二字詞+的”進入漢語

漢語史的研究表明，結構助詞“一的”的早期用例出現在宋代以後的白話資料之中。¹²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一的”與“一之”這兩個結構助詞之間的界限相當分明，直到清末仍然保持著“一的”用於白話文，“一之”用於文言文的格局。以《清議報》連載的兩個日本政治小說的譯本為例，梁啟超用文言文翻譯的《佳人奇遇》（連載於第1-35冊）通篇使用的是“一之”。而留日學生周達用白話文翻譯的《經國美談》（連載於第36-69冊）則主要使用“一的”，間或有少量的“一之”。除《經國美談》之外，在《清議報》的所有文章中使用的都是結構助詞“一之”，這也反映了當時文體的一般狀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清議報》中確實能發現一些“一的”與“一之”混用的例子，主要是以“二字詞+的”的形式出現在句子裡。例如：

為防歐洲列強之國產物製造品，與殖民的功名心，熱望所注，全欲保專有獨得之市場。（第22冊，外論匯譯，譯東亞時論〈論英俄協商與中國之關係〉，1899年7月28日）

我故此不可主張絕對的利權，當確保之。……抑外交的進取，不可不待國力之指揮。（第32冊，外論匯譯，譯東京日日新聞〈大政策與小術數〉，1899年12月13日）

夫當世界的競爭時代，德國之運命，比之自法國俄國之境以陸軍而決戰。（第99冊，時論譯錄，譯國民新聞〈帝國主義〉，1901年12月1日）

今日之必爭者，理也，勢也，人種的也，國民的也，國家的也。至爭根深結，則生死的也。（第40冊，時論匯錄，日本竹越與三郎：〈中國人種侵略世界〉，1900年3月31日）

¹² 劉敏芝：《漢語結構助詞「的」的歷史演變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08年）。

對於以上“的”的用法，我們有三個理由推測它們是受了日語詞綴「一的（てき）」的影響：一是“一的”的用例都出現在譯自日語的文章當中。以上各例涉及的《東亞時論》（1898-1899）、《東京日日新聞》（1872-1942）以及《國民新聞》（1890-1942）等日文報刊，均為《清議報》外報翻譯欄的重要信息源，其譯文很可能直接照搬了日語原文的詞語和句式。二是“一的”前接的二字詞基本上都屬於中日同形詞（見表五）。¹³ 根據這一特徵，我們可以推測這些“二字詞+的”的用例本來出現在日語裡，是通過《清議報》的外報翻譯欄被原樣照搬到漢語中來的。三是有許多“二字詞+的”的用例，如果按漢語結構助詞“一的”去解釋的話語義含混不清，而如果按日語詞綴「一的」去理解的話則比較通順，甚至有些用例中的“一的”，是不能用“一之”替換的（如前舉最後1例）。這也表明“二字詞+的”的形式雖然被照搬進了漢語，但還殘留著日語詞綴「一的」的痕跡。

在日語中，「一的（てき）」被稱為「接尾辭」，其語法功能與漢語的詞綴比較接近，而與漢語結構助詞“一的”之間卻不能劃等號。根據日本學者對詞綴「一的」的研究，漢語結構助詞“一的”傳入日語當在江戶時代後期（十九世紀前半），而宋元以來的禪宗、理學書籍以及話本小說等白話資料應是傳播的主要媒介。到明治初年，西周等人開始在英譯日一類的翻譯文章中使用詞綴「一的」，而明治十年（1877）以後，隨著「一的」的使用量不斷增加，逐漸形成了有別於漢語結構助詞“一的”的日語獨自的用法。¹⁴ 按照《スーパー大辞林》（三省堂，電子版）的釋義，日語後綴「一的」的主要用法有：

㊦主に物や人を表す名詞に付いて，そのものではないが，そ

¹³ 在《清議報》中也有少數“一的”前接詞不是中日同形詞的例子，如“隊伍的”、“柔緩的”、“輸運的”、“死事的”、“死君的”等，其用法與古漢語白話文相類似，本文沒有將它們列入研究對象。

¹⁴ 參見〔日〕山田巖：〈發生期における的ということば〉，《言語生活》120号（東京：筑摩書房，1961年）；〔日〕廣田榮太郎：〈的という語の発生〉，《近代訳語考》（東京：東京堂出版，1969年）等論文。

れに似た性質をもっていることを表す。…のよう。…ふう。

「百科事典—な知識」

㊦主に抽象的な事柄を表す漢語に付いて、その状態にあることを表す。「印象—な光景」

㊧物事の分野・方面などを表す漢語に付いて、その観点や側面から見て、という意を表す。…上(じょう)。「学問—に間違っている」。

顯然，日語後綴「一的」的這些用法是漢語結構助詞“一的”所不能涵蓋的。《清議報》時的國人以漢語的“一的”去理解日語的「一的」，把日語“二字詞+的”的形式原樣照搬進漢語，這難免會給人貌似神離似懂非懂的感覺。然而筆者認為，儘管日語後綴「一的」的用法最終沒能進入漢語，但“二字詞+的”在《清議報》等出版物中頻頻出現，¹⁵客觀上起到了把結構助詞“一的”從白話文領域擴展到文言文領域的助推作用，對日後“一的”全面取代“一之”的歷史進程有直接影響。

(二) 漢語“一上”的新用法

在《清議報》中，除了上述“一的”之外，值得關注的還有接在名詞之後的“一上”的新用法。《漢語大詞典》中名詞“上”共有25個義項，其中與名詞後的“一上”有關的義項有⑫⑭⑯等，摘要如下：

⑫用在名詞後。表示在物體的表面。《易·渙》(前十二世紀)：“風行水上。”唐代韓愈〈晚泊江口〉詩(八世紀初)：“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魂。”

⑭用在名詞後。表示一定的處所或範圍。《孟子·梁惠王上》

¹⁵ 在比《清議報》稍晚的《新民叢報》(1902-1907)《民報》(1905-1908)當中，“二字詞+的”的用例又有明顯的增加。

(前二世紀)：“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戰國策·秦策一》(前一世紀)：“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

⑯用在名詞後。表示事物的某一個方面。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學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秦牧〈一幅古畫的風味〉(1960以前)：“這幅畫在考古上的價值是不待說了，就是單單從藝術的觀點看來，也很令人讚美。”

從以上釋義可知，義項⑫⑭的用法古已有之，其共同特點為“一上”接在表示實物或處所的具象名詞之後。與此相對，義項⑯的不同在於，“一上”接在表示抽象事物的名詞之後，其含義略有引申，表示“…方面”。由於《漢語大詞典》沒有舉出義項⑯的古漢語書證，而只有現代漢語的用例，我們可以據此推測它是一個晚近出現的用法。在《清議報》中可以找到許多這種用法的例子，《漢語大詞典》的書證年代可以據此提早40多年。例如：

視西方之希臘有過之無不及。政治上之思想，社會上之思想，藝術上之思想，皆有亭毒六合包羅萬象之觀。(梁啟超：〈論中國人種之將來〉，第19冊，1899年6月28日)

十九世紀為政治上競爭革命之時代，二十世紀為經濟上競爭革命之時代，此有識者之公言也。(梁啟超：〈論中國人種之將來〉，第19冊，1899年6月28日)

今共和國雖自認為國際上(日本以國與國相交曰國際)之主權國，然毫無法律上與歷史上之證據，安足取信哉？(第34冊，地球大事記〈英國社國之主權問題〉，1900年1月31日)

雖有宗教上之爭，政治上之爭，與及種種之爭競，蓋皆未有如人種之爭其慘憺結果之甚者。(第34冊，地球大事記〈南阿英蘭兩種人之戰鬥力〉，1900年1月31日)

前2例出自梁啟超的文章，他對引進日語詞彙一向持積極態度，其時又身在日本，有條件通過閱讀日文書報，直接借鑑日語的詞句。後2例出自外報翻譯欄之一的“地球大事記”，雖然沒有標明原文出自何方，但從文章的日語詞含有量來看，譯自日語的可能性相當大。

其實，以上所舉的“抽象名詞+上”表示“……方面”的用法，在幾年前的《時務報》中就已經出現，當時的用例幾乎都出自日本人古城貞吉的譯文，這也恰好可以證實該用法來自日語。到《清議報》時，“抽象名詞+上”表示“……方……面”的用例數量明顯增多，表明這一用法已經為漢語所接受。

七、小結

本文利用詞彙史研究的方法，對《清議報》中的三字詞進行了全面分析，主要目的在於，辨別其中的日語借詞並對相關的研究方法有所梳理。在此將主要結論歸納為以下4點：

(1) 本文對《清議報》中的三字詞進行了詞源辨別。把所有三字詞區分為“在早於《清議報》的日方資料中可以找到用例”、“在早於《清議報》的日方資料中找不到用例”，以及“在晚於《清議報》的日方資料中可以找到用例”等3種情形，並以此為依據區分出日語三字詞與非日語三字詞。結果顯示，在《清議報》2+1型三字詞中，屬於日語借詞的三字詞佔絕大多數（358詞，91.6%），由清末中國人自造的三字詞只佔很小的比例（24詞，6.1%），而且大多利用了日語三字詞的構詞法。

(2) 對於三字詞的後部1字語素，本文主要從語素義和構詞功能這兩個方面作了分析，並將結果概括為“語素義與構詞功能均未變化”、“語素義未變而構詞功能變化”以及“語素義與構詞功能均有變化”等3種情形。從數量上看，屬於第1種情形的後部1字語素最多，似乎三字詞的後部1字語素主要是沿襲漢語原有的功能，來自日

語的影響不佔主導地位。但實際上，無論上述3種情形中的哪一種，其中的日語借詞都佔有壓倒性多數。

(3) 許多後部1字語素構成三字詞的功能，與其說是通過古漢語或來華傳教士資料傳承下來的，不如說是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進入漢語的日語借詞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文中以“一所”、“一點”、“一性”為例所作的論述，足以說明這一點。此外，第2種情形與第3種情形的出現更是日語三字詞直接影響的結果，除了本文中涉及各個後部1字語素之外，還有哪些三字詞的後語素屬於同類，是值得今後繼續探討的課題。

對後部1字語素的分析表明，近代以前的漢語裡並非不存在2+1型三字詞，而日語三字詞對漢語三字詞的影響主要在於：擴展了三字詞中後部1字語素的構詞功能，給一部分原本在漢語裏只能構成二字詞的後語素賦予了構成三字詞的功能。與此同時，也把在明治日語裡形成的，利用同一後語素進行系列性構詞的功能帶進了漢語，使清末時尚未穩固的漢語三字詞的構詞法得以確立。¹⁶

(4) 如果將本文的調查結果與《時務報》相比較的話，兩報中三字詞與四字詞的總體情況如表六所示。

¹⁶ 筆者此前曾利用來華傳教士資料對此問題做過分析，參見朱京偉：〈《時務報》（1896-98）中的日語借詞——文本分析與二字詞部分〉，《日語學習與研究》第3期，頁19-28中5.1的內容。

表六：《清議報》三字詞、四字詞與《時務報》的比較

		日方用例早於《清議報》	日方用例無或晚	合計
2 + 1 型 三字詞	《時務報》	255 (59.9)	171 (40.1)	426
	《清議報》	358 (91.6)	33 (8.4)	391
2 + 2 型 四字詞	《時務報》	104 (59.8)	70 (40.2)	174
	《清議報》	225 (78.1)	63 (21.9)	288

從數字中可以看出以下特點：其一，無論《時務報》還是《清議報》，三字詞的總量都多於四字詞，而且來自日語的三字詞也明顯多於來自日語的四字詞。其二，在《時務報》中，日方用例早的三字詞與四字詞分別佔59.9%和59.8%，而在《清議報》中，日方用例早的三字詞與四字詞分別佔91.6%和78.1%，即是說，與時間稍早的《時務報》相比，到《清議報》時，來自日語的三字詞與四字詞的比例出現大幅上升（分別上升31.7與18.3個百分點），這表明日語借詞進入漢語的過程正處於方興未艾的上升階段。

徵引書目

-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強學報・時務報》收於《中國近代期刊匯刊・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日〕山田巖：〈發生期における的ということば〉，《言語生活》120号，東京：筑摩書房，1961年。
- 〔日〕佐藤亨：《現代に生きる幕末・明治初期漢語辞典》，東京：明治書院，2007年。
- 〔日〕狹間直樹：《共同研究 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年。
- 〔日〕廣田榮太郎：《近代訳語考》，東京：東京堂出版，1969年。
- 〔日〕樺島忠夫、飛田良文、米川明彦編：《明治大正新語俗語辞典》，東京：東京堂出版，1984年。
- 〔日〕惣郷正明・飛田良文編：《明治のことば辞典》，東京：東京堂出版，1986年。
- 日本國語大辭典第二版編集委員會、小學館國語辭典編輯部：《日本國語大詞典（第2版）》，東京：小學館，2000-2002年。
- 石雲豔：《梁啟超與日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 朱京偉：〈《時務報》（1896-1998）中的日語借詞——三字詞與四字詞部分〉，《日本學研究》22，北京：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2012年，頁94-105。
- 朱京偉：〈《時務報》（1896-98）中的日語借詞——文本分析與二字詞部分〉，《日語學習與研究》2012年第3期，頁19-28。
- 朱京偉：〈在華宣教師の洋学資料に見える三字語—蘭学資料との対照を兼ねて—〉，《国立国語研究所論集》1，東京：国立国語研究所，2011年。

- 朱京偉：〈蘭学資料の三字漢語についての考察〉，《国語研プロジェクトレビュー》，第1卷，2011年，頁117-141。
- 朱京偉：〈《民報》(1905-1908)中的日語借詞〉，《日本學研究》19，北京：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2009年。
- 朱京偉：《漢字文化圈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8年。
- 李國俊：《梁啟超著述繫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
- 李運博：《中日近代詞彙的交流——梁啟超的作用與影響》，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
- 沈國威：〈現代漢語「歐化語法現象」中的日語因素問題〉，《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7，2011年3月。
- 沈國威編著：《漢字文化圈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8年。
- 陳力衛：〈試論近代漢語文體中的日語影響〉，《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7，2011年3月。
- 章清：〈「界」的虛與實：略論漢語新詞語與晚清社會的演進〉，《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7，2011年3月。
- 黃河清編著：《近現代詞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 黃興濤：〈新名詞的政治文化史——康有為與日本新名詞關係之研究〉，《新史學（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12月。
- 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 劉敏芝：《漢語結構助詞「的」的歷史演變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08年。
- 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6-1993年。